

源遠流長的館藏善本

冀叔英

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，初建于一九一〇年，辛亥革命后，一九一二年重新开馆，于今恰值七十大庆。而北图的藏书渊源，却可以追溯到七百多年前，这要从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基础说起。清季末年推行新政，张之洞以大学士分管学部，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，一九〇九年（宣统元年）七月，学部奏请将“热河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，暨避暑山庄各殿座书笈……，并请饬内阁将宋元旧刻，翰林院将《永乐大典》，无论完阙破碎，一并送部交图书馆储藏”。（《宣统政纪》卷十七、秋七月壬申）。此请获得当时清廷批准，京师图书馆就是以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、翰林院所存经八国联军之役劫余的《永乐大典》、和内阁大库的宋、元旧刻等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来的。内阁大库的宋元旧刻和《永乐大典》是继承明代宫廷中文渊阁藏书而来，明代宫廷的文渊阁藏书，又有一大部分是继承宋、元皇家藏书而来；馆藏的宋刻《文苑英华》零本，有南宋缉熙殿藏印，仍保持南宋蝴蝶装形式，就是宋代皇家藏书的确实见证。在这样的藏书基础上，经过七十来年的发展，主要是建国以来的发展，善本古籍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，都形成了馆藏一大特色。

由清代内阁大库继承而来的藏书，还不止是宋元旧本；京师图书馆成立之初，曾由内阁大库拨交地方志数百部，这些方志大都是清代康熙至乾隆间，修《大清一统志》时，下令各地“进呈”而来的，差不多都是当时刻本，有些边远地区来不及刻版，就以抄本“进呈”。其中很多种方志在康熙、乾隆时代修“清一统志”时都使用参考过，曾

经纂修一统志的馆臣们钩乙删削，实际上是修“清一统志”的底本。二百多年来，这些资料外间很少有传本的（其中有一部分复本，后来转拨给南京图书馆）。另外还有一部分清代顺治、康熙直至乾隆时的“赋役全书”，赋役全书反映了一个时代田亩、赋税状况，是绝好的经济史料。清代赋役书历朝都有，而乾隆以前所修，流传于世者十分罕见，这批赋役全书因为是由内阁大库移来，绝大多数是顺、康间所修，而且各省均备，对研究清代初期的经济情况，是一份难得的直接资料。内阁大库的宋、元旧本，从版本源流方面看，有的是仅见的珍本，有些还是传世仅存之书，而地方志和赋役全书，则以资料性质取胜，从实际应用看，更是不能忽视的。

馆藏古籍中，还有一批无上珍本，就是敦煌出的古写本。一八九九年，地处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一个前代封闭的文化宝库，无意中被发现了。这个宝库中保藏着大量的古代卷轴装书籍，有五世纪至十世纪的大批写本，还有刻本，内以佛教经典居多；最宝贵的还有唐咸通九年（公元八六八年）刻版印刷的卷子本《金刚经》、刻印的历书、写本的大量古籍等等。可惜这批国之瑰宝，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先后为英人斯坦因、法人伯希和劫去精华约万卷，一九一〇年清政府才下令甘肃，将剩余部分移送北京，交学部图书馆保藏。从开始发现到运送迁徙，当地遗失和流入私人之手的也不少。到馆后，在陈垣先生指导下，编制目录，成《敦煌劫余录》，著录凡八千七百余卷。解放前和建国后，历年搜访，陆续有所得，连残

卷、残片在内，现在约达万卷左右。

在这样的藏书基础上，又补进国子监南学藏书，并经南北访求，得南陵徐氏积学斋、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，馆藏古籍日益丰富。当时主持善本部工作的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徐鸿宝（森玉）先生，徐老博学宏识，于古文物、图书、碑帖等有很高的鉴定水平。以后赵万里先生到馆，佐徐老襄事，三十年代以来，为收书遍访厂肆，足迹所至，兼及大江南北。三十年代初，赵万里先生编成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四卷，一九三三年刻印出版，建馆以来所藏尽收在内，这书目后来通称为“善本甲目”。同时，馆中又筹议扩充善本收藏，先就善本及普通书库旧有清代刻本、抄本中，选其罕见而刊刻较精之本，清代学者和藏书名家手校、精抄本，共得二千余种，又陆续收购五、六百种，另室贮存，称之善本乙库。一九三五年仿甲库例，编成《善本书目乙编》出版行世；一九三七年又出版《善本乙编续目》。乙库所藏乃清代刻本、抄本及清人著述，除上述内阁大库拨来清代地方志、赋役全书外，又购入升平署剧本，这些多系乾、嘉以来宫廷中演习的底本，其中一部分是乾、嘉时廷臣所编大本戏曲，如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封神天榜》、《盛世鸿图》、《昭代箫韶》等，所谓“宫廷大戏”，每种有多至二百多折的，传本也很少见。建国后，郑振铎部长在一九五三年组织编印《古本戏曲丛刊》，后在第九集中收入的这类剧本，多数是据馆藏本影印的。还有一部分是乾、嘉以下至清代后期升平署演习的零齣剧本，这些在近代戏曲史中也都是重要资料。乙编中更有相当数量的清代学者们的稿本和批校本，清刻本中的罕见本等等，都以资料性见重。北图的善本甲库和乙库书目，自三十年代出版后，流通颇广，在提供文史研究和治学之士参考利用上，起了一定作用。

解放后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国家各项

事业的发展变化，北京图书馆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；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，藏书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，也有了显著进展。从善本书的入藏情况看，说明建国后十餘年的发展超越了旧中国的三十多年。北京一解放，首先入藏的一批珍本，就是“赵城金藏”。这是十二世纪时金代刻印的一部佛教大藏经，原藏山西赵城县广胜寺，因称为“赵城金藏”。我国整部大藏经的雕版印行始于北宋开宝年间，开宝时刻的藏经，后世称为“开宝藏”，是以后一切藏经的祖本。可惜“开宝藏”传下来的极少，“金藏”是以“开宝藏”为底本刻印的，其中所收的经有几十种是其他藏经所未收的，对研究我国佛学史和印刷发展史都是重要的资料。“金藏”的流传也只此一部，三十年代初这部藏经被范成法师发现后，盛传一时，为世人所瞩目。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山西全省大部地区沦陷，四一年底日军大扫荡后，企图掠取这部藏经；我党在赵城已建抗日政权，得到情报后，在四二年春，由太岳军区和地方部队组织人力，乘夜将所存藏经背运出来；运至沁源隐蔽保存。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，由太行行署派专人保管；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，全部藏经于四月三十日就由原保管人员专程护送到京，凡存四千三百三十卷，交北京图书馆保藏，建国前夕，馆中特为筹办了一次展览会，参观人士深为我党保护古代文化遗产的费尽心力所感动，很多到场的知名之士，如李济深先生、佛教界巨赞法师都自愿为修复金藏出力。不久，馆中请到四位装裱师付精心揭裱，照原样逐卷进行修复，经过十五年功夫，至六五年已全部整修竣事。如果不是有党的领导，“赵城金藏”的命运就很难说了。

建国之初，政务院（即国务院）公布了保护文物和禁止珍贵文物、图书出口办法，并付诸实施。同时，文化部文物局对各地图书、文物的调查、保护和收集工作，也著著进

行，不遗余力。这些措施，很快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赞助，各地收藏家纷起向文物局和各级人民政府捐献珍贵的图书、文物，在这一形势下，我馆善本书藏的发展，不仅表现在数量激增，入藏书籍的质量优异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这中间，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，许多私人收藏家，通过文化部文物局捐赠了大量珍藏善本，其中不少是名贵的孤本秘笈。如周叔弢先生捐赠全部珍藏善本，凡七百余种，傅忠谟先生、翁之熹先生、潘氏宝礼堂、瞿氏铁琴铜剑楼、张约园先生、邢之襄先生、刘少山先生、赵元方先生等，他们捐赠的都是，或历代收藏，保存了百年以上的，或为一生精力所聚的宋、元精本、名刊名抄，不仅是一家的镇库之宝，而应说是全民族的精神文明结晶。这种化私为公的光辉事例，是过去旧中国时代任何人所梦想不到的。为此，在五一年由善本部举办“新收善本书展览”，五二年庆祝建国三周年，又举办内容扩大的“中国印本书展览”，按时代展出善本古籍，以介绍我国文化及印刷术发展方面的许多伟大成就和创造，同时陈列近代印刷术所印的各种书刊，这些出版物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起了重大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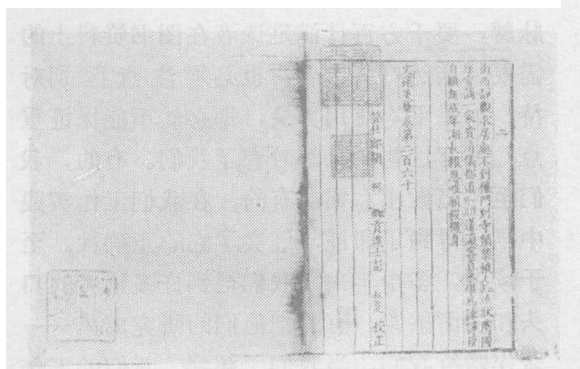
五一年，善本部还举办一次“《永乐大典》展览”。《永乐大典》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类书，全书共计二二九三七卷，分装一一〇九五册，因卷帙繁浩，始终没有刻版。现存流传的是一五六二至一五六七年（明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元年）重录的一部写本。“大典”在清乾隆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曾大起作用，从中辑出许多久已失传的珍贵资料，以后就存置在翰林院。一九〇〇年（清光绪廿六年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际，“大典”被烧毁了大部分，未毁的又多被帝国主义者盗掠而去；此后“大典”零册流散在国内外图书馆或私人之手的，常有所见。翰林院所存只剩六十册，民国初年，始拨交京师图书馆。数十年来，“大典”的

搜集工作一直是本馆采访重点之一，散在国内的，必想法购入，散在国外和无法收购的，则通过馆际交换、个别征求，或付与代价等方法，务求征得摄影本、传抄本、复制品、或缩微胶卷，以充实这一专藏。建国后，图书馆事业发生的根本变化，也反映在《永乐大典》上，首先是公私收藏家鉴于“大典”在封建时代的惨遭劫掠，并考虑到“大典”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；五一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在张元济先生倡导下，将该馆涵芬楼历年辛勤搜集的《永乐大典》二十一册，全部捐献人民政府，转交北京图书馆集中保藏。二十一册中，有四册（卷一一一二七至一一一三四）是水字韵，原来“大典”的纂修者把整部《水经注》一书，都抄入水字韵中了，这四册恰当《水经注》的上半部。更巧的是相连的卷一一一三五至一一一四一，共四册，也得保全，为北京大学所藏，恰当《水经注》的下半部，北大当局慨然将此四册捐赠，以使“大典”中《水经注》一书合成全璧。一时，个人收得《永乐大典》一册、二册的，如周叔弢、赵元方、徐伯郊、金梁、张季蕓、陈李蕓如诸位先生，都将所藏“大典”捐赠到馆。这种对古籍事业的热忱，化私为公的胸怀，在旧中国的时候，是能以想像的么？！建国之前，北图所藏《永乐大典》，连翰林院遗留六十册在内，共有一百一十册；建国后至现在，已达二百二十册（翰林院六十册在内）。数字的变化，也反映了人们精神的变化，这里面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上热爱。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影印《永乐大典》行世，全部资料，包括摄影和复制本在内，共计七百三十卷，都由北图提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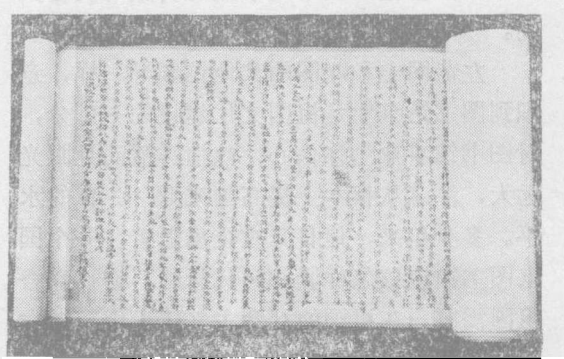
北图丰富的藏书，起着国家书库的作用，在善本古籍方面，也是这样。前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，是有名的藏书家，他以毕生精力辛勤收集了很多古典文献。一九五八年郑先生因公殉职，家属遵照郑氏遗志，

将全部藏书捐献国家，经文化部转送北京图书馆保藏。郑氏生前对图书馆事业也是关怀备至的，许多善本书是经他的努力才得为图书馆所藏的。周恩来总理对文化事业的重视，更是永远值得纪念。建国后，有两批已流至港、澳的藏书，有出手的消息，周总理知道后，立即采取措施，派人鉴定；当时由北图赵万里同志前往，鉴定后，决定购回。六五年冬，最后一批书运回后，周总理亲自过目，听取汇报，足见关怀之切。解放初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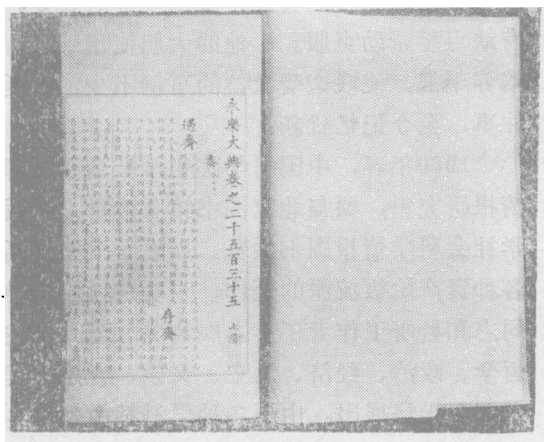
北图善本书籍不过十万余册（卷），现已达廿六万余册（卷）。建国以来，北图还以馆藏传本至罕的书，供出版社影印流通，俾使化身千万，供各方读者参考。如宋端平刻本《楚辞集注》、明崇祯刻本《天工开物》、元大德刻本《梦溪笔谈》、宋刻《经典释文》，宋刻《律附音义》等，皆以北图藏书为底本，使前人罕睹之书，能广泛为学术研究者利用，以期为四化作出贡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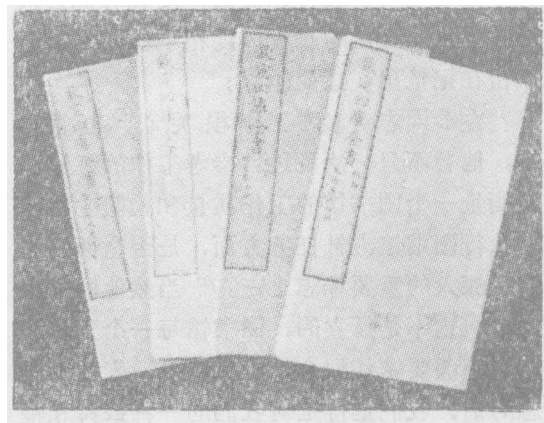
南宋缉熙殿原藏宋刻本《文苑英华》



佛经《戒缘》 敦煌出北魏太安四年写本



永乐大典



《四库全书》，十八世纪中叶清代乾隆年间的一部大丛书。全书七万九千多卷，三万六千三百余册。我馆所藏系原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那一部，完整无缺。